

改革中的哲学探索

(论文集)

● 姚传旺 主编



改革中的哲学探索

(论文集)

姚传旺 主编

工人出版社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安外六铺炕）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安徽省阜阳印刷总厂印刷

开本850×1156 毫米 1/32 印张：8.25 字数：200,000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ISBN 7—5008—0034—7/B·3 定价：2.00元

前 言

为了促进哲学现代化，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阐明和指导当前改革，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哲学教研室等单位，于1985年10月，在安徽省歙县，联合发起召开了全国哲学与改革讨论会，从不同的角度，对改革实践中的哲学问题。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当前改革的问题，以及哲学自身的改革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深入的研究。

为了让全国更多的哲学工作者和改革者了解这次会议的情况和研究成果，促进全国改革的深入开展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丰富和发展，我们选编了这本《改革中的哲学探索》论文集，收入了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论文，供哲学工作者和改革实际工作者参阅。

这本论文集是由姚传旺同志主持编写的，参加选编工作的有姚传旺、吴齐林、曹满生等同志。

编 者

1987年5月

目 录

当代世界潮流和历史唯物主义面临的挑战

.....汪永祥 (1)

改革的哲学与哲学的改革.....李砚田 (21)

论哲学改革的必然性.....荣开明 (31)

试论哲学改革的根据和方法.....吴齐林 (41)

哲学和哲学工作的改革.....史国瑞 (53)

哲学现代化的根本标志.....李怀君 (60)

哲学改革研究的方法论刍议.....欧阳康 (72)

从系统规律的研究谈哲学现代化的道路和起点

.....张景荣 (84)

基本矛盾与体制改革.....赵光武 (97)

在改革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姚传旺 (103)

思维方式现代化与我国的改革实践

.....李淮春 (115)

企业转型和思维方式更新.....谢 龙 (127)

——唯物辩证法应用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课题

经济体制改革和领导思维的辩证化.....翁世盛 (138)

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矛盾纵横谈.....范 英 (150)

改革与人才的辩证法.....石 松 (167)

改革中的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余世南 (176)

改革的时代与主体性原则·····	翁寒松	(185)
关于个体专业户的哲学思考·····	晁明寿	(194)
浅析改革时期的义利观·····	杜志新	(203)
关于对外开放的若干方法论考察·····	阮纪正	(209)
生产力的本质新探·····	曹满生	(226)
价值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地位		
·····	李连科	(237)
历史唯物主义与无产阶级人才观·····	谭继有	(251)

当代世界潮流和 历史唯物主义面临的挑战

汪永祥

一个多世纪以来，资产阶级一再宣扬驳倒了历史唯物主义，并企图用自己的形形色色的学说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然而，历史并没有按照资产阶级的愿望发展，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宣告了他们企图的破产。马克思主义确实没有得到完全证实，它的某些个别结论和个别原理已经过时，但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体现这些原理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则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显示出高度的科学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并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和战斗之后，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历史事实证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上的每一重大突破，社会制度上的每一重大变革，都既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挑战，又是推动历史唯物主义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对于这种挑战，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能置之不理，无动于衷的，而是要勇敢地面向现实，迎接挑战，在改革实践中把历史唯物主义推向前进。

一、当代世界潮流

我们今天所说的“当代”一般都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时代。四十年来，国际形势的发展，社会实践和社会

变革的进程，都出现了一系列不同于以往时代的新的特点，形成了新的世界潮流。

当代的世界潮流究竟是什么？人们无疑可以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概括和表述，事实上也确实存在各种不同的认识。但从全球角度客观地观察，当代的社会实践主要表现为两大潮流，即世界性的科学技术革命潮流和社会变革潮流。当今世界上的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发展变化，归根到底都可以从这两大潮流中得到说明。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兴起的体制改革，则是当代社会变革潮流的主流或潮头。当代两大世界潮流的蓬勃发展，正在改变着整个世界的面貌，不仅给当前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而且也将极大地影响下一世纪人类历史的发展。

以微电子技术为中心，以生物工程、宇宙开发、海洋开发、新能源和新材料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当代新技术革命浪潮方兴未艾，推动着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人类的经济政治生活以及社会主体——人本身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念、精神面貌以及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等等也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历史性变革。在科学技术革命新潮流的推动下，现代科学方法论也正在发展和深化，不仅“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已经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而且从七十年代开始，又有了“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的崛起。这标志着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和研究方法正在向综合化、一体化和量化的方向发展，从而开始摆脱传统的经验决策，上升到科学决策的水平。所有这些，都正在有力地冲击着哲学的藩篱，一切哲学理论都要在新的科学事实面前接受检验。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成果，但它也同样受人类认识史的一般规律所制约。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范畴和

原理，有些是一百多年前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形成的，有些是半个世纪前的产物，它们在当时确实反映了最新科学成就，体现了时代精神的精华。但是，今天科学技术革命的深度和广度，以及这场革命给全部人类生活实践和理论观念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所没有经历过和始料不及的。一系列新兴学科和科学成果的出现，不仅为丰富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时空观、意识论、真理论、发展论等等提供了大量的新材料和新内容，而且直接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当年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时所确立的某些原理和结论，显然已不能完全说明当前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

各种形式的社会变革连续不断，是当代世界又一巨大的社会潮流。在新的科技革命和各种社会矛盾的推动下，改革之风正在许多国家兴起。尽管这些国家在制度上存在巨大差别，改革的性质和形式也各不相同，甚至有不少对立之处。但如果撇开其中的阶级内容，就可以看出这些改革有着一些共同之点：第一，这些改革一般都可以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为中心内容；第二，以提高经济效益、人民的平均收入和生活水平为主要目标；第三，尽量避免在改革过程中发生剧烈的社会冲突和动乱，力求用较为缓和的方式达到目的；第四，在改革过程中，一些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某种程度的合作日益加强，越来越具有和平竞赛的性质。这些共同点的出现，反映了当代社会变革浪潮的新特点。

二次大战结束以来，在亚洲和东欧一些国家相继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亚、非、拉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先后进行了民族民主革命，摆脱了宗主国的统治，取得了独立。这两大革命洪流，极大地改变了战后世界的

面貌，影响着当代社会的发展。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以下的事实：

第一，西欧、北美以及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非但没有发生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反而出现了一个科学技术和经济高速发展的新时期，至今也没有形成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在这些国家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所发生的急剧变化，以及统治阶级所采取的局部调整和修补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改革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缓和了阶级矛盾，延长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寿命。情况还在继续证明马克思一百多年前的论述：“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成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资本论》第1卷第533—534页）这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必然发生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改革的客观根据，虽然，这种改革是有限度的，它不能根本解决资本主义制度所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不能避免终将被社会主义制度代替的历史规律。

第二，在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至今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科技水平和经济实力上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甚至给一些人造成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感觉。这种情况的形成，自然有其深刻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既是原先基础落后的继续，也同我们工作中的经验不足和严重失误有关。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理想国，而是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现实社会。它不可能一开始就是完美无缺的，也不可能有一个到处适用的纯粹模式，

而是要经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完善到完善的发展过程。恩格斯说：“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3页）自上而下的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实行改革，乃是无产阶级在确立了政治统治以后，社会主义社会自身发展和完善的基本方式和途径，是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动力。社会上的各种矛盾以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的某些弊端和缺陷，必须通过改革来加以克服。将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以至共产主义社会自身的发展，也必定要通过改革的道路来实现。只是到那时改革的性质和形式有所区别罢了。可见，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改革就成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必然过程，成为实现社会变革和飞跃的主要形式。

第三，亚、非、拉第三世界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虽然已大多取得政治独立，但由于科技和经济落后，它们并没有完全摆脱对大国的依附，没有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为尽快改变这种状况，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发展民族经济，增强国防力量，巩固民族独立，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正在探索改革的道路，有的已经取得积极的成果。

总之，改革正在成为一个势不可挡的世界潮流，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旋律。它和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潮流相互推动，正在日益影响和决定着人类社会的未来。

这种客观形势，给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一系列的尖锐问题。如：历史唯物主义还是不是指导人们研究社会历史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决定社会制度性质的究竟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社会革命究竟还会不会发生？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规律是否仍然有效？人类究竟通过什么样的道路走向

美好的未来？今后人类社会矛盾的性质以及发展的动力、形式、规律如何体现？现代条件下社会主体——人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等等。当代各派哲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未来学家们，都在试图对这些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历史唯物主义更不能回避这一严肃的挑战。

二、历史唯物主义面临的几个重要理论问题

哲学应该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成为文明的活的灵魂。历史唯物主义更应该跟上时代的步伐，及时总结新经验，吸收新材料，回答新问题，指明历史前进的方向和发展规律。当今伟大的科学进步和改革实践，即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严重挑战，又必然会带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大发展大繁荣。在这方面面临的任务艰巨，问题很多，这里仅就个人的粗浅认识谈谈对几个问题的看法。

第一，关于社会主体——人的地位问题。

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主体，是一切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不仅各门社会科学都在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人，而且不少自然科学学科（如生理学、心理学、生物学、医学等）都是直接为人服务的。哲学是一门从对主客体关系的研究中去揭示一般规律的科学，它当然地应把人的问题包含在自己的视野之内。

问题不在于要不要研究人，而在于如何研究人？把人的问题摆到何等地位？这是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主要分歧之点。

以人为中心的哲学早已有之，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以及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一些流派都在不同程度上主张哲学“主体化”，有的直接把哲学归结为“人学”。费尔巴哈企图从人本身来说明人和社会，这样的人只能是纯自然的生物个体，是孤立的抽象物。从这样的人出发，就根本不可能揭示人的本质，

更不可能说明社会。这样的历史观仍然是唯心主义。当代西方影响颇大的存在主义也是以人的问题为中心的，但它也是离开社会关系来谈论孤立的个人，谈论个人的“绝对自由”。萨特还曾公开申言要用他的“历史人学”来补充、完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然而，他的“历史人学”仍然是从孤立的个人和人的本质异化的理论出发的一种关于社会集团的形成和分解的理论。在萨特看来，推动社会前进的不是现实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而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人如争夺必需的生活资料而进行的生存竞争。萨特本人虽然支持革命，鼓吹造反，但他并没找到真正克服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异化根源的途径，没有找到摆脱剥削和压迫的现实道路。其结果，社会的发展只能陷于“异化——造反——再异化——再造反”的无限的恶性循环之中，所谓“人的本质复归”永远也无法实现。

很明显，萨特的“历史人学”在理论上仍然没有跳出唯心史观的窠臼，它是无法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的。然而，萨特在论证他的“历史人学”过程中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强调不无合理之处。他对唯物史观的一些批评和指责也是需要我们深思和认真对待的。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一块“人学的空场”，唯物主义哲学完全剥夺了人的主观性，而只是一种把人归结为客体的决定论。这正是造成马克思主义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出路何在呢？萨特认为出路就在于把人恢复到马克思主义之中，把人本身作为它的基础。这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

大家知道，马克思是从黑格尔出发，经过费尔巴哈到达马克思主义的。当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马、恩的早期著作中人的问题是占有重要地位的，也可以说是企图从人出发来研究社

会的。这反映了当时他们尚未完全摆脱费尔巴哈的影响，是马克思主义诞生过程中留下的人本主义胎记。然而，马克思很快就发现，在复杂的社会历史面前，人本主义完全是软弱无力的。要真正说明人和社会的本质，就必须超越费尔巴哈，把人放到一定的社会环境、社会关系中去考察，人的本质只能从多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去发现、去规定。只有更深入地去揭示人们动机背后的根源，找到推动人们采取行动的真正原因，才能揭示出历史过程的本质和规律。这当然不是抹煞人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而是把人放到它应有的历史地位，把对人的问题的研究置于真正的科学基础之上。列宁曾经这样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人们即人民群众的动机由什么决定，各种矛盾思想或意向间的冲突由什么引起，一切人类社会中有这些冲突的总和究竟怎样，造成人们全部历史活动基础的客观物质生活生产条件究竟怎样，这些条件的发展规律又是怎样，——马克思对这一切都注意到了，并指出以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途径，即把历史当作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的途径。”（《列宁选集》第2卷第586页）这正是马克思的伟大功绩。这里显然不存在什么“人学的空场”，而是为科学地研究社会历史（当然也包括研究人）指明了唯一正确的方向。

那末，“人学空场”之说究竟缘何而起呢？我认为主要来自两方面。其一，马、恩在创立唯物史观之初和此后的一段时期内，为了驳斥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唯心史观，确立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因而把论证的重点放在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上，而对人及意识的能动作用则较少论及。正是由于这一点常常被人攻击为“经济唯物主义”。恩格斯在晚年专门对此作了说明和补充，从而使唯物史观更加完备。其二，在马、恩之后，由于种种

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特别是由于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影响，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们，在理论上对人的问题普遍重视和研究不够，几乎是完全让出了这块阵地，造成理论宣传上很大的片面性。而在实践上，由于缺乏经验以及其他原因造成的一些政策上的失误，使群众的利益受到伤害，甚至使不少人受到迫害，影响了群众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这就在客观上授人以柄，把这种失误归罪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似乎唯物史观是同有关人的问题不相容的。这显然又是一种误解。

实际上，唯物史观不仅认为有生命的人的存在是社会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而且把全人类的解放作为自己理论上的必然结论，作为无产阶级奋斗的最终目标。我们今天所从事的各项工作，为之奋斗的事业，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人的幸福和解放，为了实现人的价值。过去那种不重视人、贬低人的情况，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必须坚决加以纠正的。从理论上讲，必须加强对人的问题的深入研究，改变过去那种只片面研究社会客体的倾向，转向更多地注意社会主体，确立人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应有的主体地位，最后达到主客体的统一。从实践上讲，应该更多地关心人、尊重人，关心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尊重他们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不断提高人们创造历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使人的解放与社会的解放更一致、更和谐。

然而，要真正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人的解放与社会的解放互为条件，二者相互制约，不可分离。人的解放既以社会的解放为前提，又是社会解放的尺度。如果没有人的解放，社会的解放也就成为空洞的、无意义的了。我们既反对那种脱离具体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条件，抽象议论人的价值、人的自由、尊严的倾向；也反对那种离开广大

人民群众的现实的切身利益和权利，空谈社会革命、社会解放的高调，而是主张二者的有机统一。

第二，关于社会结构问题。

历史唯物论是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历史观，它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是在天上的云雾中，而是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91页）整个人类社会是在物质资料生产的基础上竖立起来的复杂的有机系统，社会的发展是物质生产发展基础上展开的自然历史过程。唯物史观的社会结构理论也是从这一基本理论前提出发的，科学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形成是同唯物史观的建立同时实现的。

在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最早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系统阐明社会结构问题的当推《德意志意识形态》。正是在这本著作中，马克思提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科学概念，揭示了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初步形成了社会形态的理论。由于生产关系概念的形成，不仅导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规律的发现，而且进一步把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作为政治观念、国家和上层建筑的现实基础，从而达到了对社会结构的科学认识。马、恩明确指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页）并初步揭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从属关系和相互作用，开始认识到社会机体是各种关系和现象之间有机联系和完整形态。

在1846年底致安年柯夫的信中，马克思将自己关于社会结构的思想表述为：“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

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20—321页）这样，马克思就把社会结构划分为四个层次，即生产力——交换和消费形式——市民社会——政治国家。这里继续沿用“市民社会”这个旧哲学的范畴，也没有把社会意识包括进去。看来，马克思在这里是着重从客观的社会物质关系方面来观察的。

在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都进一步阐发了自己的社会形态理论，认为社会是由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三个主要层次构成的矛盾运动的体系，并认为社会形态的发展是由这三者相互作用所推动的自然历史过程。至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完全成熟了。只是由于当时确立唯物史观基本原则的需要，马克思较为强调社会的经济结构方面；而恩格斯晚年针对有人对唯物史观的歪曲，则较多地强调上层建筑诸因素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

继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普列汉诺夫提出了著名的“五项因素公式”说，认为社会的结构是：

“（一）生产力的状况，
（二）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
（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

（四）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

（五）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95页）

在这里，普列汉诺夫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基本思想为依据，从宏观上深入解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